

775-1422
〔哥伦比亚〕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著
蔺家群 译

电影导演历险记

Dianying Daoyan Lixianji



8165
EK



文匯出版社

185260
〔哥伦比亚〕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著

蔺家群 译

电影导演历险记



0459082



文 匯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 朱志鹏

封面装帧 何礼蔚

插图 沈浩鹏

电影导演历险记

[哥伦比亚]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 简家群 译

文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圆明园路149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市印十二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 字数 85,000

1983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

ISBN 7-80531-040-(8)/I·1

书号7455·40 定价: 1.15元

前 言

1985年初，智利电影导演米格尔·利廷——他被列在被绝对禁止返回故土的五千名流亡者的名单中——通过秘密手段潜入智利六个星期，拍摄了七千多米长的关于他的祖国在军事独裁统治十二年之后的现实状况的影片。利廷改变了脸形，改变了衣着和说话的腔调，使用伪造的证件，在地下民主组织的帮助和保护下，沿着国土纵深方向——甚至在拉莫内达宫内——领导了三个和他同时入境的、有着各种合法身份的欧洲摄影小组，以及国内抵抗运动另外六个青年摄影小组。取得的成果是拍摄了一部放映时间长达四小时的电视片和一部长达二小时的电影，这几天正在全世界开始放映。

大约六个月前，当米格尔·利廷在马德里向我讲述了他所做之事及其如何完成的时候，我想到，在他的影片的后面还有一部没有拍摄的影片，有石沉大海的危险。就这样，他同意接受一次长达数天的令人精疲力尽的提问，磁带录音有十几个小时。那是一部完整的、包含了他所有的职业和政治内容的、富有人情味儿的历险记。而我，只不过将它压缩成十个篇章，加以重述罢了。

为了保护那些仍然生活在智利的主人公，文中有些人名和情节略作了改动。我更喜欢使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就象利廷对我讲述时那样，尽量保持了他个人的——有时是悄悄的——口气，因此毫无轻率的戏剧性情节，也不追求历史性的奢望。最后，文字上的风格是我的。诚然，作家的声音

是不可以交替的，何况还得将六百页的文字压缩到一百五十页。尽管如此，我在许多情况下都竭力保持了他在叙述时使用的智利习惯用语，在各方面都尊重讲话人的思想，尽管他的思想并不总是和我的相吻合。

从调查方法和材料的性质来看，这是一篇报告文学。但还不止于此：这是再现了一次令人激动的历险行动，他避开了来自军政方面的种种风险，成功地拍摄了一部影片，其最后结局，毫无疑问，远比原来的设想更加深刻、动人。利廷本人这样说过：“这并非是我一生中最英勇的行动，但却是最值得的行动。”的确是这样，我认为这也正是他的伟大之处。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1985年12月于西班牙

作者简介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1928年在哥伦比亚马格达莱纳的一个小镇上呱呱坠地。父亲是当地的一个医生。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二十岁上开始记者生涯以前，曾在大学攻读法律和新闻。他多次担任报刊的驻外记者，使他有会接触各界人士。

1955年，他的处女作长篇小说《落叶》问世，以后又陆续出版了小说《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恶时辰》，以及短篇小说集《格朗德娘的葬礼》。此外，他还写了几个电影剧本，但反响平平。

1967年，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长篇小说《百年孤独》一经发表，立刻轰动世界文坛，小说不胫而走，使他一举成名，被誉为哥伦比亚和拉丁美洲最主要的小说家。1982年，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从此声誉鹊起。

1985年，他发表了又一部长篇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至今已被译成多种文字。

《电影导演历险记》系他最近完成的一部报告文学。他在一次答记者问时说，这是他所作的“将新闻与文学创作相结合的一次尝试。”

目 录

前言.....	1
作者简介.....	1
第一章：米格尔·利廷秘密回智利的历险.....	1
改头换面.....	3
“如果你笑，那就没命了”.....	6
给皮诺切特安上一条长长的驴尾巴.....	8
第二章：第一次失望：城市繁华.....	11
“我就是为这而来”.....	14
在我怀念的中心.....	17
可怕的寂静引起的回忆.....	21
第三章：留下的人们也是流亡者.....	24
三个被砍头的人打倒了一个将军.....	25
“祝贺你是乌拉圭人”.....	27
留下的人们也是流亡者.....	30
第四章：圣地亚哥五个基本点.....	36
圣地亚哥五个基本点.....	39
转过街角：我的岳母就在那儿.....	42
大桥是这一切的见证.....	44
第五章：大教堂前面一个自焚的人.....	47
塞瓦斯蒂安·阿塞维多广场上永不凋谢的 鲜花.....	49
在康塞普西翁刮胡子真难.....	50

地狱里的一座爱情天堂.....	55
海鸥栖息的酒吧.....	57
第六章：两个永远不朽的死人：阿连德和聂鲁达.....	60
两个虽死犹生的人：阿连德和聂鲁达.....	63
黑岛的地总在颤动.....	66
“格拉西娅飞上天了”.....	69
第七章：警察伺机以待：包围圈开始收拢.....	71
确切的距离：十首博莱罗舞曲.....	74
包围圈开始收拢.....	77
“你喜欢我的屁股吗，先生”.....	79
第八章：注意：有位将军准备讲出所有的一切.....	83
降落伞上的一位老祖母.....	85
长时间寻找埃莱克特里克将军.....	89
谁能理解警察.....	91
第九章：连母亲也没认出我.....	93
“利廷回来了，拍完电影，又走了”.....	95
“为祖国的未来拍张照片吧”.....	100
“你大概是我儿子的朋友”.....	103
第十章：在警察帮助下的圆满结局.....	108
餐馆里的一个疯子.....	111
“你要么走，要么潜伏下来”.....	114
两个混进来的人寻找作者.....	117

第一章

米格尔·利廷秘密回智利的历险

我乘坐的从巴拉圭亚松森起飞的智利铜山航空公司 115 航次班机，在误点一个多小时之后，就要在智利的圣地亚哥机场降落了。左边，约七千米的高空中，在熠熠的月光下，阿空加瓜峰就好象是一堆钢铁。飞机向左侧倾斜着，姿势优美，而又令人胆颤心惊。然而，随着听来毛骨悚然的金属咯吱声，机师又扳正了机身，飞机象袋鼠一样在跑道上跳了三跳，安全着了陆。我，米格尔·利廷——埃尔南和克里斯蒂娜的儿子、电影导演，是被绝对禁止回国的五千名智利人中的一个。在流亡了十二年之后，我又重新踏上了祖国土地，尽管我明知自己仍然是一名流亡者：我携带的身份证是假的，护照是假的，甚至连妻子也是假的。但由于衣着和化妆，使我的脸庞和外表大大改变了本来的模样，数日后，连我自己的母亲在灯光下也没能认出她的儿子来。

世界上得知我这个秘密的人仅有数几个，其中之一是与我同搭一架飞机的。她名叫埃伦娜，是智利抵抗运动的成员，年轻而富有魅力。她所属的组织指派她和国内地下网保持联络，建立秘密接触，确定合适的会晤地点，分析行动中的形势，商定约会时间，保证我们的安全。如果我被警察发现，或者失踪，或者超过二十四小时未实现事先约好的联络，那么，

她应当公开宣布我已回到了智利，向国际舆论界报警。我们两人的证件虽然互不关联，但我们从马德里出发旅行，就俨然象一对和睦的夫妻，已经闯过了半个地球的七个机场。不过，在这最后一个半小时的飞行途中，我们决定分开来坐，下机后也装做互不相识，她必须在我之后通过移民检查，为的是万一我碰到什么麻烦，她好向他们的人通风报信。而如果一切顺利，在机场出口处，我们再装做夫妇相挽而行。

我们扮演这种角色的意图很简单。但是，在实践中却隐藏着很大的风险：这就是要秘密拍摄一部在军人独裁统治十二年后智利现状的纪录片。这一直是我的梦想，很久以来就始终萦回在我的脑海里，因为智利的形象在我的思念中变得模糊了。对于一个电影工作者来说，没有比回到国内拍摄电影，以恢复记忆中祖国的形象更加正确的方法了。当我渴望实现这一梦想时，智利政府公布了准许回国的一批流亡者的名单，没有任何一份名单上有我的名字。在此之后不久，又公布了涉及五千人的不准回国的名单，其中赫然有我。我绝望了。而在一个偶然的、至少是意外的场合下这一计划最终得以实施时，我的梦想已经破灭了两年多。

那是1984年的秋季，巴斯克地区的圣塞瓦斯蒂安城。六个月前，我、埃莉以及三个孩子在那里安顿下来，准备拍摄一部故事片。正如电影秘史中许多其它片子一样，在开拍前的一个星期就被制片商取消，胎死腹中。我感到走投无路。电影节期间，我和朋友们在一家大众餐馆里共进晚餐时，我重又提起了那个宿愿。他们听着，议论着，兴趣盎然。这不仅因为它具有明显的政治意义，而且还可以作为对皮诺切特政权的一种嘲讽。不过，谁也没考虑要为流亡生涯中的这一纯粹的幻想做点什么工作。已经是凌晨时分，我们沿着这座

古城沉睡的街道回家途中，意大利制片商卢西亚诺·巴尔杜济抓住了我的胳膊，他装作无心地把我从人群中拉了出来，而在餐馆内他几乎没开过口。

“你所需要的那个人，”他对我说，“在巴黎等着你。”

一点不错。我所需要的人在智利国内抵抗运动中担任着很高的职务，他的设想，仅仅在一些方法的细节上与我并不一致。在卢西亚诺·巴尔杜济的热情参与下，我和他在灯红酒绿的科波尔饭店谈了四个小时，就把我长期酝酿而又不能实现的愿望变成了现实，我们甚至谈到了最最微小的细节。

第一步是向智利派去三个基本摄影组：一个意大利组，一个法国组，另一个可以是欧洲任何国家，但须带着荷兰证件的组。三个组都应该是合法的，要有官方的许可，并得到各自使馆的正常保护。意大利组最好是由一名女记者率领，以拍摄智利的意大利移民纪录片作为掩护，重点放在华基诺·托埃斯卡的工程上。华基诺·托埃斯卡是营造拉莫内达宫的建筑师。法国组应当申请拍摄一部关于智利地理生态的纪录片。第三个组则是去考察最近发生的几次地震。无论哪一个组都不应当知道有其它两个组的存在。除各组负责人之外，任何成员也不应该知道他们实际上在干的事，不允许知道谁是幕后指挥。小组负责人必须是知名的专业人士，具有政治修养，了解这次行动可能遭到的风险。这是最易办到的一部分，我到各组的所在国做了一次短期旅行，问题就都解决了。三个摄影组正式办理了登记手续，并照章签订了合同，而且都已经进入了智利，正等待着我抵达那晚带去的指示。

改头换面

其实，对于我来说，最困难的事莫过于变成另外一个人。

改变一个人的个性需要天天进行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个人会经常变更自己的决心，总想恢复自己本来的面目。因此，最大的困难不是象人们想象的如何学的问题，而是对改变外表和举止行为的下意识的抵制。我得忍耐着放弃本来的我，而变成另一个十分不同的人，一个在迫使我离开祖国的警察面前也不会露马脚，甚至连自己的朋友也难以认出我的人。两位心理学家，一位电影化妆师，在一位智利杰出的地下特别行动专家的指导下，用了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同我要继续做原来的我的本能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之后，终于创造了奇迹。

第一件事是胡子。这不是简单地一剃了事的问题，而是要从胡子所带来的特点中解脱出来。年青时代，当我拍第一部影片时就留下了胡子。之后，我曾几次剃掉过，但从来没有在拍片时是没有胡子的。好象胡子已成了我做导演不可分割的部分。我的叔伯们也都蓄着胡子，这无疑助长了我对胡子的感情。几年前，我在墨西哥时曾剃光了胡子，我没能使我的朋友们，我的家庭，更不用说我自己接受这副新的面孔。大家觉得好象是跟一个突如其来的陌生人在一起，但我坚持不再蓄须，因为我以为这样可以显得更年青。还是我的小女儿卡塔莉娜帮我解决了难题。

“没有胡子，你看起来更年轻些，”她说，“但更加不好看。”

因此，这次为了进入智利，不得不再次剃掉胡子时，就不仅是剃胡膏和剃须刀的问题了，它成了改变个性特征的一桩更为复杂的事。他们先是一点一点地剪短我的胡须，观察各种变化，看看胡须的长短在我外表上性格上所带来的效果，直到剃光它为止。我过了好几天才鼓起勇气探头照了照镜子。

然后是头发。我的头发是乌黑的，这是从希腊母亲和巴勒斯坦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我的头发还受到过早秃顶的威胁。他们首先把它染成浅栗色。之后，他们又给我试了几种发型，最后还是决定不违背自然。至于秃顶部分，他们没有象起初考虑的那样将它加以伪装，而是使之更加显眼，他们不仅把我的头发贴着向后梳，而且还用镊子拔掉脱发部分的细毛。

尽管令人难以置信，但是有些几乎觉察不到的修饰确实可以改变面孔的形状。虽然，我当时的体重比现在要少几公斤，但我的脸型仍是满月式的，拔去眉梢后圆脸才显得长了些。奇怪的是，这样一来，比我天生的模样更加东方化，倒更符合我的身世。最后一步是戴上有度数的眼镜，起初几天我会感到剧烈的头痛，但它不仅可以改变我的眼形，而且可以改变我的目光表情。

身体的造型比较容易些，但需要我付出更大的精神努力。面部的改变实质是化妆上的事情，而身体形态的改变则要求从心理上进行专门训练，要求更加高度的集中力。因为在那里我必须彻底地承受地位上的变化。我不再穿经常穿惯了的牛仔褲和猎装，我必须养成习惯，选用英国毛料缝制的欧洲名牌西服，定制的衬衣、鹿皮皮鞋，意大利绘花领带。我不再使用我那智利农村联珠炮弹式的口音说话，而必须学会最适合于我的新身份的乌拉圭富翁说话的节奏。我必须学会用不象我原来特有的方式笑，学会迈四方步走路，学会在交谈中使用手势，加强说服力。总之，我必须不再是一位一向穷困潦倒、牢骚满腹的电影导演，而成了我在今生今世中最不愿意做的人：一个青云得意的资产阶级。或者象我们在智利所说的那样：一具行尸走肉。

“如果你笑，那就没命了”

在我改扮成另一个人的同时，我已逐步习惯同埃伦娜一起生活，我们住在巴黎十六区的一所住宅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顺从由别人，而不是我自己事先安排好的规律生活，我得象乞丐一样节制饮食，以便使我87公斤的体重减轻10公斤。这不是我的家，甚至与我的家毫无相似之处。但是，在我的记忆里，它应该是我的家，为了避免将来的矛盾，我就得竭力将它印在脑子里。这是我一生中最离奇的经历之一，因为很快我就发现，在私生活上，埃伦娜也是亲切而严肃的，可我从来没法同她住在一间屋里。专家们是根据她的政治与职业水平挑中她的，她应当强迫我按铁的纪律行事，不能有半点自作主张。而我自以为是的个性却难于接受这一点。之后，当一切都进展顺利时，我才逐步意识到，我原先对她的态度是不公平的，也许是下意识地将她与另一个我的世界混同起来，尽管明知是事实，但我还是难以适应那个世界。如今回想起那段奇异的经历，我不禁自问，是否归根到底我们不是一对完美的夫妻：在同一屋顶下，我们几乎不能相互忍受。

埃伦娜不存在身份问题。她是智利人，尽管十五年来从未长期住在智利。她没有被流放过，也没有受到过世界上任何警察的审讯，所以，她的掩护是天衣无缝的。她在好几个国家执行过很多重要的政治任务。在她自己的国家拍摄一部地下影片的想法，对她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困难的问题是在于我。因为出于技术上的缘故，乌拉圭这个国籍最适合我，迫使我必须具有一种与自己完全不同的性格，替自己编造一段在这个我并不熟悉的国家的经历。不过，在预定的日期到来以前，我已经学会，当有人呼唤我的假名时立即回过头去，我能够

回答有关蒙得维的亚城最稀奇古怪的问题，国家该乘那一路事，甚至有关二十五年前我在第十一中学的同学的状况。这所学校座落在意大利大街上，离一家药房有两个街区，离一个新建的超级市场有一个街区。唯一应该注意的是笑，因为我笑起来太特别，尽管化了妆也会暴露我自己。所以，负责为我改头换面的人一再慎重其事地警告我说：“如果你笑，那就没命了。”不过，对于一个贪婪的国际巨商来说，有一张毫无笑容的铁板脸，倒是不足为怪的。

那些天，由于智利宣布了新的戒严令，出现了一个未曾预料到的问题必须认真研究。计划实施的时机因芝加哥派经济冒险的惨败而遭到损伤的独裁政权，就采取这种方式来对付第一次处在统一阵线下的反对派的联合行动。1983年5月，人们开始了街头抗议，整整一年内曾多次大爆发，并有经验丰富的年青人、尤其是妇女参加，但是也遭到血腥镇压。合法的与非法的反对派力量，第一次加入了资产阶级中最进步的阶层，组织了为期一天的全国大罢工。这显示了社会的力量与决心，但激怒了独裁政权，戒严令提前宣布了。皮诺切特气急败坏，尖着嗓子大吼大叫，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反响：

“如果再这样下去，我们将再来一个九月十一日。”

确实，对于一部想要将内部现实中难得为人见到的部分暴露出来的影片，就如我们要拍的影片，这些情况看来是有利的，但同时，警察的控制将更加森严，镇压会更加残酷，有效时间则因宵禁而缩短。不过，国内抵抗组织分析了局势的所有方面，主张继续向前，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样。这样，在预定的风和日丽的日子，我们便扬帆起航了。

给皮诺切特安上一条长长的驴尾巴

第一次严峻的考验发生在从马德里机场出发的那一天。我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见到埃莉和孩子们：波奇、米格尔和卡塔莉娜，甚至没有直接从我的家属那儿得到任何音讯。负责我安全的人们的主导思想是一走了事，不必通知他们，以避免告别时的难舍难分。在最初制定的方案中还考虑过，最好不要把真情告诉家人。但不久，我们就发现这是毫无意义的。相反，谁也比不上埃莉在后方工作更为有用。往来于马德里和巴黎、巴黎和罗马之间，甚至到布宜诺斯艾利斯验收并监督冲洗我从智利一点一点送出的资料片，甚至在必要时为我们筹措补充资金，从事所有这些活动，埃莉是最合适的人选。事实也正是如此。

另一方面，我的女儿卡塔莉娜从我开始准备时就发现，在我的房间里堆放着与我衣着习惯以及我的性格完全格格不入的新衣服。她是如此茫然和好奇，使我不得不把家人召集到一起，让他们了解我的打算。他们以高兴和共谋的心情对待这件事，他们好象生活到了以往我们全家为了寻开心而虚构的一部影片之中。但是，当他们在机场上看到我变成了有点象牧师般的乌拉圭人，很少象原来的我的时候，他们和我都意识到那部影片就发生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既重要又危险。不过大家的反应是相同的。

“重要的是，”他们对我说，“给皮诺切特安上一条长长的驴尾巴。”

他们说众所周知的一种儿童游戏，一个蒙上眼睛的小孩要准确无误地替一个用硬纸板做成的驴子安上尾巴。

“一定，”我一面估计着我打算拍摄的片子的长度，一面

回答他们说，“这条尾巴将有七千米长。”

一周之后，我和埃伦娜在智利的圣地亚哥着陆了。也是出于技术上的缘故，为了使我渐渐习惯我的新身份，这次旅行在路线没有事先作出安排的情况下，漫游了欧洲七个城市。我有一份无懈可击的护照做后盾。其实，这是一份真正的乌拉圭护照，使用的是合法持证人的姓名和特征，他知道这份护照将被加以伪造，用来打进智利，他把它作为政治上的贡献交给了我们。我们唯一要做的是换上我化妆后拍的照片。我的东西也都按照护照上的名字作了安排：我的衬衣上绣上了这个名字，我的文件手提包上用的是这个名字的第一个字，名片和书写纸也都印上了这个称呼。经过好几个小时的练习，我还熟练地学会了模仿他的笔迹签字。由于时间紧迫，唯一不可能解决的是办张信用卡，这是一个危险的失误，因为象我所装扮的人的身份，在旅途中使用美元现钞购买几张机票，是使人难以理解的。

我和埃伦娜很难相处，要是在现实生活中，两天就得离婚。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学会了象在最糟的家庭悲剧中维持下来的夫妻那样行事。每个人都熟知对方虚构的生平，虚构的过去，虚构的资产阶级嗜好。我相信，即使在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盘讯中，我们也不会犯严重的错误。我们编造的故事是万无一失的。我是设在巴黎一家广告公司的经理，我们携带着一套摄影设备，准备为推销一种香水新产品拍摄广告片，这种香水将在明年秋季投放欧洲市场。我们所以选择智利，是因为这是一个少有的，一年四季都可以找到从炎热的海滩到终年积雪的风光的国家。埃伦娜身穿昂贵的欧洲服饰，举止落落大方，令人爱慕，同在巴黎我被介绍见到的披散着头发、穿着苏格兰方格裙和女学生皮便鞋的她，真是判若两人。